

马为龙图腾主体原型考^①

黄 权 生

摘要：本文通过地名、神话传说、民俗信仰、考古材料考证马就是龙图腾原生态主体原型之一，龙马可以互变，马崇拜就是龙崇拜。在我国西南地区还广泛存在着这种民间信仰和民俗活动。

关键词：马 龙 图腾

一、马为华夏游牧民族的图腾考

笔者通过地名和传说研究得出远古龙和马一体，龙即马，马即龙，因此马应当是龙图腾的最重要的原型之一，马化龙、龙化马、龙马互变。^②《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先祖柏翳：“昔为舜主畜，蓄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可见在五帝时期就有专门养马的部落了，学者认为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已经驯养了马，如“中国北方是早期驯养马的中心之一……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已很容易地支配、驯服马，进而到驯养了马。”^③（美）谢弗认为（直到唐朝）乘马是贵族的一种特权，政府甚至禁止工匠和商人乘马，而马是一种贵族动物，它对其主具有实用价值外，它在古时候还具有更高的特殊地位被赋予了奇异的品性，是怪异和超凡脱俗的，被印上出自神种的烙印。几乎所有名驹都被当作是龙的化身。^④人类学家在研究史前艺术时，曾系统分析了洞穴岩画中各种动物类别，指出在两大类食草动物中，几乎在所有岩画所显示出来的动物形象中其中的一类几乎全是马的形象，其持久不变的出现简直令人惊奇^⑤。岩画所体现的就是远古人类对马的图腾崇拜。

大禹之父鲧的部落是以白马为图腾的^⑥，而鲜卑、柔然、蒙古、东胡等游牧民族也都是以马（大多是白马）为自己氏族的原生态图腾^⑦。旺堆认为藏族人民对马的认识不只是简单的代步、运输工具，而且是他们有灵性的沉默而可靠的生存伙伴和雪域生命力的象征，故藏族群众也有奉马为图腾^⑧。姜德军研究认为：“随着马在其生产和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进而在制度文化层面形成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蒙古族对马由依赖而重视，由喜爱而敬畏，最终形成崇拜。马成了蒙古族的图腾，马文化也就成为蒙古族文化的代表，成为牧业文明的代表。”^⑨蒙古族认为人死后依靠马的帮助，马可以把人魂带进天堂，因为马属阳，象征天并为天神所驱使，特别是白色的骏马常常被认为是天的开启者和贯彻者，古人幻想借助于白马的力量与天神沟通，成为神与人最适合的中介^⑩。在蒙古族文化中，马被奉为“神”。在北方岩画中最早出现的“史前艺术”中就有马的形象。在草原上，人们把那种没有一根杂毛的纯白马视为“圣物骏马”视为“长生天”派来的使者，马为蒙古民族崇拜的图腾。^⑪“大约从距今一万年年开始，原始人逐渐把野马驯养成为家畜，从此马开始成为人类直

接使用的工具。一些氏族往往把与自己氏族有密切关系的马，主观联想成同自己氏族有着特殊的亲属关系，把马视为自己的祖先、亲族或保护神而虔诚崇拜，出现了马的图腾崇拜……马图腾崇拜曾经在原始社会一些游牧氏族或部落中起过维系团结、统一意向、统一行动的作用”¹² 马图腾信仰不仅对游牧民族起到促进发展维系民族内部团结的重要作用，还对华夏民族的统一龙图腾崇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马与历代王朝统一及隆兴关系密切考

汉族或其他游牧民族，能入主中原甚至一统天下必须既要拥有农业基础，又要拥有大量马匹来源，是古代中国得天下的二大必要条件，故马才是对中国历代政权发生更迭及民族融合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要因素¹³。关陇之地是周、秦、汉和唐隆（龙）兴之地，此处既有农业基础，以地望而论，又有大量马匹来源，具备古代中国得天下的二大必要条件。有人认为秦在远古时代是以赢（马的前身）为图腾¹⁴。那么作为第一个统一的中国，开始信仰的图腾是马而不是龙了吗？而汉唐崇马史书记载更多，如汉武帝派李广利数万人马西征取大宛“汗血宝马”（天马），故《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前113年）作《天马之歌》以颂战马：“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唐太宗所骑六骏而自撰《六马赞》，还刻石镶于墓室，示至死不能须臾离六骏，这些都是马对王朝的重要作用造成的，故《新唐书》卷三十六曰：“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另外马作为图腾，人乘马能到达祖先以及上界的宗教信仰造成的，故帝王墓前多石马且一些还带有翅膀，期望死后马能引导他们到达天堂。故西方人认为：“汉武帝让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寻找天马（即传说中的神马），他渴望能得到一批超自然的骏马，以便带着他飞升天界。”¹⁵

古代王朝统一战争，均以北方政权统一为主，是北方多马而北方人善于御马造成的。如前面所提《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善于养马，其先祖在夏朝养马，而到西周养马而得国。后来秦皇统一六国，马之功居其半，兵马俑可为佐证。而认为秦在远古时代是以马为图腾是完全可能的。秦汉以来，历代帝王借助龙树立权威的主要方式之一是把自已的诞生神秘化，声称与龙有密切的关系，说自己是龙种、龙子。秦始皇被称为“相龙”（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汉高祖也自称为龙，如《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用马（武力）得天下，用龙治天下。因为“封建帝王为了维护其统治，借助龙来树立自己的权威；而龙也因此而获得更为显赫的地位，受到崇拜，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政治和文化。与龙有关的各种观念、现象、习俗等，组成了绚丽多彩的龙文化。其影响之广，渗透之深，是世所罕见的。”¹⁶ 中国历代王朝谁得马而可得天下，得天下必以龙自居，身着龙袍，坐为龙椅，国之本为农，而农业之本为水利，龙为水神，有龙助得享农业丰收，龙

的化身天子，龙则成为皇权的象征，成了统治国家的手段。

事实上农、牧世界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变更，构成了历史自身发展运动的重要动力^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特色之一，二者间的交融与冲突曾直接影响着王朝盛衰、世代隆替，也左右乃至规定了它们自身的发展方向^⑨。游牧民族的代表文化——马文化和汉民族的代表文化——龙文化，二者在文化融合中既有交融又有抗争的关系，游牧马文化与汉族的龙文化的在文化相互交融与渗透中，推动华夏民族文化向前发展^⑩。笔者认为马为龙图腾崇拜最重要本源之一，龙图腾信仰主要来自马图腾信仰。

三、龙图腾原生态信仰主要来自马图腾信仰考

1. 龙是复合（综合）图腾

2007年全国政协会议全国政协委员周宜兴说，“龙”在中华各个民族中传承了三四千年。但时至今日，对“龙”文化还缺乏一个历史的、科学的、文化的研究。因此他提出在五千年历史断代工程之后，再开展一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笔者此提议甚善。闻一多在1942年《人文科学学报》发表《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一文，指出：“然则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的答案是：它是一种图腾（Totem），并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揉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作‘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Klan）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欲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蛇图腾说”或“综合图腾说”，是目前最为流行的观点。但龙图腾的原生态图腾或者最核心图腾来源之一并不是蛇，而是马。

图腾的原始意义主要是图腾是祖先，或与之有血缘关系，或者保护神^⑪。人们必然与这些崇拜的物件有某种紧密的关系，如太阳是给人们阳光，大地给予人们食物等，故图腾的信仰对象必须与人们有紧密的关系，前面讲到我国古代一些游牧氏族把与自己氏族有密切关系的马，主观联想成同自己氏族有着特殊的亲属关系，把马视为自己的祖先、亲族或保护神而虔诚崇拜，出现了马的图腾崇拜。古代国家对马十分重视，而古代王朝专门设有马政。而相比蛇而言，马与人更亲密，与人们生活生产结合得更紧密，对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具有更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最早的图腾是动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动物图腾崇拜最早的又可能是哺乳动物，因为哺乳动物的形貌、生理特征和行为与人较接近，较容易被人认为是同类。”^⑫故马较爬行动物（如蛇）更易成为人类的图腾，而与人类关系紧密的家畜（六畜）中比较，《三字经》有“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故知，马与牛羊列上珍三品，而马居六畜之首。

但是笔者不否定龙图腾吸收其他图腾的可能，如东汉王充所著《论衡·龙虚篇》曰龙是“马蛇

之类”，就指出龙是现实之中存在的生物，可能是马与蛇复合的，而马为首。笔者亦承认龙蛇互变传说，考古发现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画像也非常多，但是流传在西南地区民间的龙蛇互变神话传说较少，而保存了大量原生态文化的龙马互变传说，而龙与其他动物相结合产生的地名也以马为主，龙与马从西南历史文献、民俗学、地名学来看都是结合最为紧密的，成了龙可变马，马可变龙，龙马一体的观念和认识。

2. 龙马图腾关系考

我国游牧民族大多有马图腾信仰，而秦在远古可能也以马为图腾，而汉唐崇马，唐的隆兴受鲜卑（鲜卑有马图腾信仰）的影响，而魏晋南北朝的北方各政权必然崇马图腾，辽、西夏、金与而后入主中原蒙古满清都与蒙古一样是马背上的民族必然都曾以马为图腾，只是受中原的文化影响，以现在的龙代替原来马为图腾，但是马的原生态图腾信仰除在华夏古籍之中有记载外，还在西北和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无意识的保存下来。下面就以保存图腾文化较为原生态的西南地区为例对龙马图腾关系进行探讨。

（1）从西南神（龙）马神话传说看龙马图腾关系

西南地区有大量的神马传说，如蜀地越巂“天马”的神话，《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天马河，马日千里，后死于蜀，葬江原小亭，今天马冢是也。县有天马祠。初，民家马牧山下，或产骏驹，云天马子也。今有天马径，厥迹存焉。”^②刘琳注云：越巂自古产马。汉代称为“笮马”，是与内地交易的著名土产。东汉安帝时，曾于越巂置长利、高望、始昌三苑以养马。故该地以出良马而有“天马”的神话。

滇池神马传说：《华阳国志·南中志》载：“章帝时，蜀郡王阜为益州太守，治化尤异，神马四匹出滇池中，甘露降，白鸟见；始兴文字，渐迁其俗。”^③《水经注》载：“长老传下流浅，言池中有神马，家马交之，则生骏驹，日行五百里。晋太元十四年，宁州刺史费统，言晋宁郡滇池县两神马，一白一黑，盘戏河水之上。”^④能嬉戏水中之神马，非龙莫属。

《黔志》所载养龙坑地：“在养龙司，去贵阳百里，壤接于乌江，盖以马而得名。其事见于明臣宋濂《天马赞》。曰：‘西南自昔出良马，而产于罗鬼国者尤良。’或云‘罗鬼，疑即古之鬼方。其地有养龙坑，在两山中，泓停渊深，开阖灵气，而蛟龙实藏其下。当春日始和，物情酣畅，土人立柳坑畔，则牝马之贞者系之，已而，云雾晦冥，咫尺不能辨色，类有物蜿蜒上与马接，盖龙云。逮天色开霁，视马旁有沙，有龙迹者，则与龙遇。谨其刍菽而节宣之，即产，必获龙驹焉……’臣濂稽诸载籍，汉之元鼎有神马，出渥洼水中，马之生于水者，尚矣。养龙之说，虽相传于土人，要当为不诬也……赞曰：‘天马四茨，蛟龙开，灵泓澄，神马生。……唐明皇时，灵昌郡得异马于河，龙鳞虺尾，拳毛，环目，肉鬣，居帝闲二十年，后西牵至咸阳，马入渭水化为龙，盖亦类是矣。’”^⑤

《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其先有一妇人，名曰沙壶，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鱼自给。忽于水中触有一沉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产子男十（九）人。后沉木化龙出，谓沙壶曰：‘若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惊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龙坐，龙就而舐之。沙壶与言语，以龙陪坐，因名曰元隆，犹汉言陪坐也。沙壶将元隆居龙山下。元隆长大，才武。后九兄曰：‘元隆能与龙言，而黠有智，天所贵也。’共推以为王。时哀牢山下复有一夫一妇，产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⑥该神话传说说明该地的祖先为龙，

龙化人，而结合前面神马为龙，马生水中，马可化龙的传说，该地龙亦为马也。因为“图腾分类并不像科学分类那样考虑物质的差异，因为它所遵循的是神话思维的类比逻辑。”^②如《随巢子》云“夏后之兴，方泽出马”，西南地区的马与龙有共同的生于水的习性，故《续黔书》卷八记载养龙坑所养马为“水马”^③，也就是在西南各族眼里龙即马也，马即龙也。如《马边厅志》记载马湖：“昔人以牝马系湖岸，龙出与交，屡产异马，明升得之贡于都下。”^④清陆次云《峒溪纤志》记载龙马：“间世一出，苗人欲得其种，于春月择牝马系于溪畔柳荫之下，俄而云雾忽生，晦冥之中，龙与马接。生龙驹，能行千里。”^⑤中国西南地区的主要民族群体有氏羌系统、百越系统、百濮系统，早在先秦时期，西南古代各民族群体便兴起了崇龙之风。而龙对西南古代民族群体的影响源远流长^⑥。而龙马可以交配，龙马互生，马实为西南远古民族龙崇拜现实动物图腾。

养马之地为养“龙”之地，而该地马可入水为龙，龙马互变体现了西南地区特殊地理环境中，拥有大量盆地、坝子、河谷为农耕地区，而农耕四周则为少数民族游牧区，该状况到清末整个少数民族的生产还是畜牧业为主。故《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认为少数民族的畜牧业在农业生产中的比例为60-70%。而西南地区“茶马”古道贸易一直在不间断的进行者，由其名茶马古道可知该地区马的重要性，也为神马神话传说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相比北方，这里农耕与游牧更能交错存在，共生性更强。

《汉唐地理书钞》辑《遁甲开山图》：“陇西神马山有渊池，龙马所生。”这样看西南神马好像是北方传到西南。事实上在北方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张骞出使西域，看到通过印度运到邛竹杖、蜀布和枸酱在西域交换，而运输而去的交通工具必为马匹。中国马匹出产之地，除北方草原外，高大善于奔跑，但耐力差，西南的蜀滇黔马，小而善于爬山越岭，长于山路，南北各有所长。《唐书·南诏传》：“越睢之西，多荐草，产善马”，如蜀地西南地区的“建昌马”亦驰名国内，行小而特善登山^⑦。《黔囊》记载黔地马小而习险^⑧。清檀萃《滇海虞衡志》卷七《志兽》：“谓兽莫巨於象，莫有用於马，皆南土所宜也。故《志兽》首之，况出自滇产，因之而不后。……南中民俗，以牲畜为富，故马独多。……马产几遍滇，而志载某郡与某某郡出马，何其褊也。”^⑨前面讲到在先秦时期，西南古代各民族群体便兴起了崇龙之风。林向先生认为金沙江流域有着悠久的龙崇拜（包括蛇、鱼、马等灵物崇拜）习俗，都认为是“龙的传人”，其中该地区鱼、虫、蛇、马不分，而南下的氏羌系民族特别重视马匹，有“马龙”神话、“鱼龙”神话^⑩。笔者2004年八月有幸在凉山自治州博物馆看到大量春秋到秦汉时期的有龙马的枝形器，馆长说这是神马（龙）是通天的法器。神话传说可以和考古相印证。吕思勉认为中国最早记载的盘古化生故事（神话）恰在佛教大量汉译之时，“其为窃此等说加以文饰而成，形迹显然，无待辞费。”^⑪认为中国一些神话是从西方印度传到中国的，而西南近印度，受印度影响则较早，故才会有蜀布邛竹杖等通过印度而到中亚。茅盾认为中国神话原产生在南方，而后渐渐北行^⑫。以此类推，中国龙马神话可能是从中国西南传向全国的。由于西南特定的众多少数民族原始图腾信仰和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农耕与游牧共生性，茶马古道马帮至今不衰，保留了大量的龙马图腾远古文化原始的信息。

(2) 从西南龙马互变地名看龙马图腾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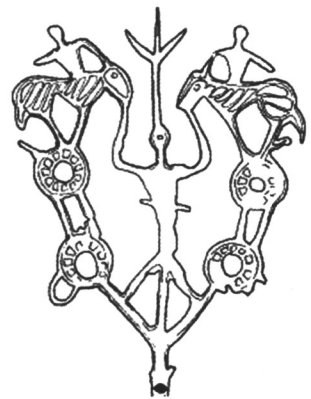
何星亮先生认为：“地名源于图腾名称，最早的地名即图腾名称，这可在许多地名中找到确凿的证据。”^⑳如正德《四川志》载马落崖：“在治南五里，唐狱吏王昌过之，泸南计事夜过，马乘之疾如飞，过崖鸡鸣，马化龙入江，至府印尚未干，有马蹄迹，古碑记。”^㉑同治《直隶绵州志》记载马龙洞：“治西四十里马龙山神，马化龙处深叵测祷雨辄应。”^㉒清嘉庆《四川通志》记载通江县地名龙潭：相传有龙出此化马腾跃石上有迹^㉓。曲靖地名白龙洞山：“有马迹在石岩上，昔神龙化马故流迹，宛然白龙……”^㉔等等。这些地名都记载了马化龙与龙化马的神话传说，而到目前为止，笔者在西南地区方志山川地名之中还没有找到龙与其他生物互变的地名，由此可见马图腾是龙图腾的最原始的最重要原生态图腾之一。

(3) 从西南各民族的祈雨习俗看龙马图腾关系

除地名信息外，在西南地区人们祈雨习俗看，龙就马，马就龙，龙马互换，或者是龙马一体。神马，色尚白，与水有关，居水而可兼水神。^㉕《清一统志》载白马山：“旧有白马现其上，土人立祠祀之，有祷辄应。”^㉖《寰宇通志》载龙马蹄石：“其石高四尺，围六尺。上有龙马蹄迹，傍有四小石，呼为风雨师，遇旱祷之辄应。”^㉗光绪《叙州府志》载天马山：“以云之有无卜阴晴，甚验。”^㉘正德《四川志》载白马泉：“深山谷中，俗传：昔白马出游，人逐之入泉，祷雨多应。”^㉙等等，不胜枚举。在西南各族人们心中有马的地方就能祈雨，起因还是对龙马一体的认同感，以及对遥远图腾信仰中马为人们的保护神，有神马帮助便可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这里的马难道不是水神龙吗？

(4) 从西南考古材料看龙马图腾关系

笔者所见凉山博物馆收藏的枝形器呈铜片状各牵一马或一兽，或一手牵双马或双兽，马或兽皆立于树顶端之璧型物上，左右相对而立，有的马上还骑有人。根据这种枝型器奇特的造型，刘弘馆长认为它也是一种通天的神树，也是人神相通的天梯。树端所立之人，即能登天沟通天地人的巫师，上古时期的巫师有男有女，枝型器上的人物给予了这个史实确凿的证明。巫师牵引的双马双兽也立于树端，应是巫师升天的坐骑^㉚。三星堆发掘的商代青铜龙形饰：“龙为大头，头上有带齿的角和宽耳，吻上翘，张口露齿，身细长，兽蹄足，长尾后迤，作行进状，尾尖微残。”由此知该动物基本为一匹正在行进的马形象。三星堆神树：“树的一侧，有一条龙缓树而下，龙身呈辫索状马面头……”^㉛该树上之龙也为马面，头部是种动物最关键的部位，该龙为艺术化的马。笔者湘西调查所知土家族的巫师梯玛道具（神器）之一是铜马，由铜造，有的马上骑有八部大王。这些马就是巫师与天沟通的坐骑。藏族连地接天的经幡旗被称为“风马”“祭马”“禄马”；云南用以沟通人间与灵界的工具叫“甲马”，西南地方建房的工具叫“木马”（因为西南少数民族心里，房屋柱头以及梁木都是通天的）木匠师傅砍大梁时候还要祭木马可见马为上天的重要媒介，由考古材料结合民俗知马为图腾圣物。



（说明：上图枝形器转载自钟雅莉《盐源青铜艺术初探》《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4期）

(5) 从西南各民族的通天（天梯）神话看龙马图腾关系

前面提到在金沙江流域发现的枝形器的马为巫师升天的坐骑，而西南至今流传大量的马可升天及飞腾的能力，如正德《云南志》记载寻甸军民府龙马迹：“在府城西大石上，相传昔有异人乘龙马过此，留迹焉。”^④明正德《四川志》记载马落崖：“在治南五里，唐狱吏王昌过之，泸南计事夜过，马乘之疾如飞……”^⑤嘉庆重修《清一统志》记载腾越直隶厅龙马窝：“相传，(?)逐马走如飞，后生驹，善骤，因以名之，《明通志》：南诏时，有龙马饮于此。”^⑥嘉庆《三台县志》记载奇巩山：“治东北三十里，汉纪信将军获马于此，后汉祖困荥阳，急，信授高祖马（前所获马），先驰去，信乘黄囊出降，汉祖始得免。”^⑦而中国传说中帝王所乘都是龙，而现实中都是乘马，看来附会与神化的原型只有可能是马，而非其他。如云南永北府红石崖：“在府西北五里，丹崖千尺，下临大河，俗传神禹乘赤龙治水至此，以神斧劈之，故崖色尽赤，崖上有春水泉。”^⑧笔者考察西南的通天神树马桑树中的“马”就是龙，二者可以互变，马桑树就是登天的天梯在现实传说的缩影^⑨。左上图的三星堆神树所攀绕的龙（在西南被称为马）就是附着在天梯上的登天使者。神话传说在三峡堆考古文物以及西南众多神马枝形器中找到了答案。现在在弥勒县红万村彝族人（阿细人）祭祀火神的过程中火神的“卫士”（巫师）坐骑（用竹篾扎成马，用纸裱糊并彩绘，用粽叶装饰马毛马鬃的两匹神马）是祭火活动的关键神物，是火神的飞龙马，马背上会长翅膀，天马行空，独来独往^⑩。可见马至今在西南少数民族仍为通天的神兽，是为上天的重要媒介。

(6) 西南马图腾信仰遗存看龙马图腾关系

前面所讲弥勒县红万村彝族人（阿细人）祭祀火神的头（前）一天是农历的二月初二，阿细人认为这一天是法定的祭龙日，而这个神是密枝神（龙）是管牛马的神，而祭祀为白羊白鸡，他们在祭龙山的龙树下祭祀，其祭词：“今天我们来祭，来祭吉祥龙，这是吉祥龙，这是平安龙，是我们的寨龙最能保庄稼。龙是护牲龙，龙是供灵龙，龙是秋实龙，龙是护家龙。祭龙使粮丰，祭龙使水盈，祭龙壮耕牛，祭龙肥驮马。”^⑪这里的龙是阿细人的保护神，具有明显的图腾崇拜痕迹，龙是管牛马的神，神马为通天神兽，现实的马和通天的马已经完全分离，该地重要交通工具仍为马匹，而作为龙的图腾原型马基本被龙取代了，只是剩下马通天的功能。纳西族送亡灵仪式叫“惊马”，由丧家牵出两匹马，一匹供亡灵骑，一匹驮亡者生前用品，即时东巴用热水淋马头，马遂作受惊状，象征亡灵已骑上马背，东巴助手再在马头撒一撮白面，后所有人躬腰大喊“请您上马，慢慢去吧，放心去吧。”^⑫纳西族用马送亡灵，认为马是送人到祖先地方去的媒介，寓示马与祖先伴生，是有马图腾崇拜的痕迹。但是西南一些民族仍以马为图腾的，如现在阿昌族一些氏族有以“喇米扬”（即马）为图腾的^⑬。白族有以白马为图腾，傣族的一些氏族以马为图腾^⑭。可见马图腾信仰及痕迹在西南非常多，但是相比龙图腾信仰则要少一些，而从少数民族认为龙是管马的神，人回到祖先哪里要马的引导看，马是龙的图腾原型可能性是最大的。

3. 马为华夏龙文化原生态图腾的普遍可能性

龙马同为华夏混沌未分的远古时期神人乘驭的神物，古籍记载龙和马同为远古英雄乘驭的工具，这与马为骑乘交通工具在现实中最具成为龙的可能性，如《大戴礼记·五帝德第六十二》记载：“黄

帝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扈云，以顺天地之纪。”高辛“春夏乘龙，秋冬乘马。”龙与马都是可以乘驭的，故“春夏乘龙，秋冬乘马”龙与马自为一类神物，而《楚辞·离骚》记载：“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饮余马于咸沔兮，总余乱辔乎扶桑……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则也表明龙与马均为乘驭的神物，是同类的。有人据《礼记·月令》及《吕氏春秋》都直称“驾苍龙”而推论所驾的“苍龙”就是马。“马”上古音meng，与龙字上古音相同，则马即是龙，并非近似龙形⁶⁵。

我们知道图腾文化是人类早期的混沌未分的一种文化现象⁶⁶。而龙马相混而同类，如《周礼·夏官·瘦人》记载：“马八尺以上为龙”。《周礼·夏官·庾人》：“马八尺以上为龙……六尺以上为马。”其意都是骏马都是龙，《辞海》对“龙马”的解释有三种：一是古代传说中形状像马的龙；二是骏马之意；三是比喻精神健壮。而其二为与马相关的解释。闻一多先生说：“天文房星为龙，又为马。……龙像马，所以马往往被呼为龙，骑马人则应该是驾龙上下于天地的神灵——太皞等众神。”⁶⁷《汉唐地理书钞》辑《遁甲开山图》：“陇西神马山有渊池，龙马所生。”此讲神马即为龙马，明陈仁锡《潜确类书》卷一一一引《瑞应图》云：“龙马者，神马也，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长颈，膊上有翼，旁有垂毛，鸣声九音，有明王则见。”《汉书·礼乐志》应劭注云：“乘黄，龙翼而马身，黄帝乘之而仙。”《尚书·中候》：“龙形马衔甲，赤文绿色。”孔颖达注：“龙形象马，甲所以藏图也。”可见远古龙即马，马即龙，马成了龙图腾的最重要的现实参照物。结合前面所讲马可祈雨、通天，而龙马互变神话，笔者肯定马具有了龙全部的灵性和神性，在这个核心不变的前提下，在华夏用马为坐骑的铁骑得天下的规则下，以马为图腾核心融合了可能是蛇、鱼、虎、羊、猪、狗、熊、鸟等图腾部落以及植物崇拜和其他自然崇拜的部落，最终形成华夏龙的图腾形式，这个过程是华夏各族从新石器直到春秋战国秦统一最终成形，而秦的远祖就是马图腾，而到秦始皇到汉代，龙图腾形象就基本固定下来。

《人类的方向》一书指出“如有新的事物出现，便会被简单地插入到原有的类目中的某一类中去。当欧洲航海者来到澳洲时，土著人便将新来者归类到某一图腾群集。新因素的出现并不需要重新安排已有的图腾分类图式，这个图式是松散开放的，足以使任何新的对象组合到自身中来。”⁶⁸这个过程固定不变的确定形态，而是综合其他图腾的变相（形）神的图腾。我们不要以现在的人思维看问题，因为“原始人（却）不管这些。他们的生命观是综合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没有什么东西具有固定不变的确定形态。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在瞬间变形的过程中转化为其他事物。如果说神话世界有什么突出特征的话，如果说它有什么支配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⁶⁹叶舒宪认为：“图腾分类并不像科学分类那样考虑物质的差异，因为它所遵循的是神话思维的类比逻辑。”⁷⁰华夏龙图腾形象融入其他图腾非常简单，其任何特质图腾都可以融入龙图腾之中，就似华夏文化是融合了各个时期活动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的各种文化甚至印度、西亚等外来文化的因子，但是其最根本的华夏文化没有变，只是丰富了华夏文化的丰富多彩的内容。

龙作为复合的华夏图腾，遵循的是神话思维的类比逻辑，是游牧、农耕、渔猎文化融会的结果，无论那种生产方式，或者那个民族，在华夏数千年历史长河中，马是除人类自身外，是最重要的生

产力。马是统一和民族强盛的前提条件，是华夏数千年文明不断延续的动力，是民族的保护神，是龙图腾原型最重要的本源之一。

①基金项目：该文得到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时期武陵民族走廊人口流动与生态变迁研究”（11CZS018）的资助。

②黄权生：《龙马·马龙·神马·白马·水马·天马——中国西南地区“龙马”地名和传说研究初探》，《西南史地》（第一辑），巴蜀书社，2009年12月出版

③（美）斯坦列·丁奥尔森著、殷志强译：《中国北方的早期驯养马》，《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

④（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136-137页

⑤王立：《龙马传说与马文化的神话内蕴》，《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2年第4期

⑥黄震云：《伯禹馭鯀与龙马图腾》，《职大学报》，2006年第1期

⑦阿尔丁夫：《论骏马“特殊魔力”的由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⑧旺堆：《青藏高原的马文化》，《西藏民俗》，1999年第2期

⑨姜德军：《试论“马”、“龙”文化及二者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⑩丽霞：《蒙古族的马崇拜浅析》，《民俗研究》，2004年，第1期。

⑪芒来：《内蒙古自治区马文化与马产业的现状与发展》，《鄂尔多斯学研究》，2009年第4期。

⑫林琳：《论秦代以前中华民族的马文化》，《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⑬[香港]郭伟川：《略论马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兼评姜戎〈狼图腾〉》，《汕头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⑭何汉文：《嬴秦人起源于东方和西迁情况初探》，《求索》，1981年第4期

⑮（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138页

⑯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353页

⑰赵林：《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冲突融合及其历史效应》，《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⑱高翔、刘凤云：《论古代中国北方的农耕与游牧——对两种文化关系及发展趋向的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⑲姜德军：《试论“马”、“龙”文化及二者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⑳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12页

㉑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13页

㉒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

㉓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

㉔王国维校：《水经注校》卷三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

㉕罗书勤等校：《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59页

- ②⑥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四《南中志》，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第424页。
- ②⑦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327页
- ②⑧罗书勤等校：《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240页
- ②⑨光绪二十一年《叙州府志》，卷五，《山川》
- ③⑩清陆次云《峒溪纤志》下卷“龙马”
- ③⑪杨正权：《龙与西南古代氏羌系统民族》，《思想战线》，1995年第5期
- ③⑫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第319页。
- ③⑬罗书勤等校：《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447页
- ③⑭清檀萃：《滇海虞衡志》卷七《志兽》
- ③⑮林向：《金沙江：中国西部龙》，《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4期
- ③⑯吕思勉：《先秦史》，1941年，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第43页
- ③⑰矛盾：《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37-139页。
- ③⑱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113页
- ③⑲正德《四川志》，卷之十八，《山川》，潼川府
- ④⑰同治十二年，《直隶绵州志》，卷七，《山川》
- ④⑱嘉庆《四川通志》，卷之十一，《輿地志·山川》重庆府。
- ④⑲光绪二十年《云南通志》，卷二十，《地理志三之十·山川十》曲靖府上
- ④⑳黄权生：《龙马·马龙·神马·白马·水马·天马——中国西南地区“龙马”地名和传说研究初探》，《西南史地》（第一辑），巴蜀书社，2009年12月出版
- ④㉑嘉庆重修《清一统志》，卷四百八十，《山川》楚雄府
- ④㉒明彭时等纂修：《寰宇通志》，临安府，《古迹》
- ④㉓光绪二十一年《叙州府志》，卷五，《山川》
- ④㉔正德《四川志》，卷之二十二，《山川》，雅州
- ④㉕刘弘：《若木·神树·鸡杖》，《四川文物》，1998年第5期
- ④㉖陈德安：《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62页
- ⑤⑰正德《云南志》，卷十一，《古迹》
- ⑤⑱正德《四川志》，卷之十八，《山川》，潼川府
- ⑤⑲嘉庆重修《清一统志》，卷四百九十八，《山川》，腾越直隶厅
- ⑤⑳康熙四十六年《顺庆府志》，卷二，西充县
- ⑤㉑光绪二十年《云南通志》，卷二十六，《地理志三之十六·山川十六》
- ⑤㉒黄权生：《马桑树传说建木考》，《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 ⑤㉓葛永才：《火祭》，《中国西部》，2007年第1期，第49页
- ⑤㉔蒋剑：《密枝祭祀》，《中国西部》，2007年第1期，第31-41页

- ⑤⑧和少英：《逝者的庆典——云南民族丧葬》。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 ⑤⑨李国文：《通向彼岸的桥梁——云南民族宗教信仰》，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 ⑥⑩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页
- ⑥⑪岳珍：《马龙：蚕的化身——中国龙原型试探》，《中国文化研究》，2003夏之卷
- ⑥⑫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22页
- ⑥⑬闻一多：《伏羲考》，《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⑥⑭皮科尔（J.Peacock）、基尔希（A.T.Kirssch）：《人类的方向》，普伦提斯出版会1980年版，第142页。
- ⑥⑮卡西尔：《论人：人类文化哲学导论》，英文本，耶鲁大学出版社1944年版，第81页
- ⑥⑯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327页

作者简介：黄权生：(1977-)，男，重庆巫山人，长江三峡发展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湖北省人文社科基地三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三峡论坛》副主编。主要研究三峡和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作者联系方式：电话：13477125812，邮件：huangqsh518@163.com。